

柯林斯

《冲突社会学：走向一种解释的科学》(1975年)*

伦德尔·柯林斯是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社会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生于1941年，幼时曾随父母（其父为美国职业外交官）在国外旅居多年，到过西德、苏联、西班牙、爱尔兰和南美诸国。后回美国念书，先在哈佛大学学习社会学，修过美国社会学大师帕森斯的课程。1964年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学习社会学，研究戈夫曼和布鲁默（两人当时均为该校社会学教授）的思想，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在母校及圣地亚哥大学和弗吉尼亚等学校工作，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河边分校社会学教授。

柯林斯的著作主要有《冲突社会学：走向一种解释的科学》（1975年）、《文凭社会》（1979年）、《韦伯主义社会学理论》（1985年）、《理论社会学》（1986年）以及“论宏观社会学的微观基础”（1981年）、“互动仪式链、权力和财产”（1987年）、“冲突理论和宏观历史社会学的进步”（1990年）等一批论文。其中《冲突社会学：走向一种解释的科学》（以下简称《冲突社会学》）是其代表作，集中

* 本书无中译本。本文系根据纽约学术出版社1975年英文版写成。

反映了柯林斯的社会学思想,代表了柯林斯对社会学理论的主要贡献。

正如该书书名所标示的那样,《冲突社会学》一书的主题是社会分层与社会冲突。柯林斯认为,分层和冲突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过程,它们触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财富、政治、职业、家庭、俱乐部、社区、生活方式等等,以至于任何关于分层和冲突的理论模式都必然把这些方面联结在一起,从而在社会学的概念领域内占据一个突出的位置。然而与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及其对立面——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不同,柯林斯不仅关注宏观的社会过程,而且更关心宏观的社会过程得以存在的微观机制。柯林斯后来写道:“我对冲突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为那些宏观的理论添加一个微观的层次。我尤其试图表明分层和组织都是奠基于日常生活的互动之上。”在《冲突社会学》一书中,柯林斯以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加芬克尔等人的本土方法论以及符号互动论等微观社会学理论为基础,对日常交往、家庭、组织、国家等不同结构层次上的分层与冲突过程进行了解释,从而建立了一个融微观与宏观过程于一体、以微观过程来解释宏观过程的独具特色的社会冲突理论。

《冲突社会学》一书共分十章,以下根据各章内容,在尽量保持原书面貌的前提下,对其作一简单介绍。

一、走向科学的社会学

《冲突社会学》一书的主题是社会分层与社会冲突过程。柯林斯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比以往的功能理论、互动理论和宏观冲突理论更具科学解释力的社会学理论。然而,在该书中柯林斯同样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建构起一种这样的“科学的”社会学理论?这不仅体现在该书的副标题中,而且也体现在该书的章节安排

中：《冲突社会学》一书既以对上述问题的讨论起始（第一章“为什么社会学不是一门科学？”），又以对上述问题的讨论终止（第十章“走向一门社会科学”）。

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相比，社会学迄今为止显得还不是一门成功的科学。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分歧只在于如何解释这个事实。一些人认为这是由于社会学相对说来还很年轻所致，要使社会学成为一门成功的科学，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研究和更科学的方法。另一些人则认为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性质使得它并不必然要成为一门科学。柯林斯认为这两种解释都不能使人信服。他认为社会学可以成为一门成功的科学，并且这个目标正在日益接近实现。问题在于要去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卷入了一些什么东西，有哪些因素阻碍了这个目标的顺利实现。

柯林斯指出，对于社会学来说一直存在着许多目标：一般解释、实用性、意识形态评价和审美理解。这些目标不仅互有区别，而且其实现的途径也是大有歧异的。通过构造最终基于经验的因果陈述来对现实事物作出概括性的解释是科学的基本任务，科学就是从特殊中发现一般、从已知中推出未知的一种方法，这无论是对于物理学来说还是对于社会学来说都是相同的。实用研究则是为了帮助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取得某些具体的目标，如解决某些社会问题。意识形态评价则主要关心社会运行目标的合理性，探讨什么是社会的最佳形式，评估某种特殊制度安排是好还是坏等等。审美理解则对上述三个方面均不关心，它只潜心于创造一种知识产品，这种知识产品的价值仅在于它自身。对社会学来说，这四种目标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不能说其中的某个是对的而其它的都是错的。然而我们也必须明确它们之间是互有区别、不可混淆的。事实上，正是长期存在着的这样一类混淆阻碍了社会学顺利地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由于把科学等同于实用研究、或价值评价、或审美理解，科学的真正目标——概括性解释就被忽略了。因此，尽管社会

学在资料搜集和理论建构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但它们的真正意义却仍然有待于确认。

柯林斯认为,社会学比我们通常相信的要更为发达。一个强有力的解释性理论的基本要素早已存在于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等人的著作当中,最近几十年的研究则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这些早期的成果,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说已经拥有了一个可以用来建构一门科学的社会学的稳固框架。柯林斯认为,这个稳固的解释性理论框架主要是以分层和组织研究领域的成就为基础的。分层和组织研究构成了一般社会学理论的核心,社会学的其余方面都只不过是分层和组织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应用而已。《冲突社会学》一书,就是以分层和组织研究方面的成就为核心,来构造一般社会学的解释理论框架的一个初步尝试。

为了给如何建构一门以概括性解释为特征的“科学的”社会学提供一个范例,在《冲突社会学》一书中,柯林斯试图尽可能地采用因果陈述的方式来概括、表达书中的有关思想。像“一个人越是以平等交换的方式与他人互动,他就越是以非正式的、友好的方式进行行动,越是趋于接受他人的思想”。“一个人越是相信在未来成为命令发布者或命令接受者的可能性,他就越是会采取那种地位的态度”、“一个人越是以组织的名义下命令,他就越与这个组织相认同”之类的形式命题在书中比比皆是,达数百条之多。柯林斯的这种理论表达方式,使得他的著作在形式上在当代社会学家中也是颇具特色的。

二、分层理论

分层理论在柯林斯的冲突社会学中占据着一个核心位置,是整个冲突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它在《冲突社会学》的第二章中得到

了初步的阐述。

柯林斯以马克思和韦伯的分层理论模式作为他的出发点。他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抽取出三条有关分层的基本原理：

1. 谋求生存的物质环境是决定一个人生活风格的主要因素；既然财产关系对于区别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具有关键性，阶级文化和行为便沿着控制或缺乏财产这两个对立面而产生分化。

2. 为动员本阶级成员使之成为一个紧密的相互联系的团体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社会的各阶级之间也是不同的；这意味着，各阶级生活方式之间的另一个主要差别来源于其团体组织化方面的差别以及社会沟通手段方面的不同经历。

3. 各阶级在精神生产手段的控制方面也存在着差别；这导致了阶级文化方面的另一个差别——某些阶级比另一些阶级更善于进行符号性的表达，而某些阶级则只有一些由其他阶级从外部强加给他们的符号结构。

柯林斯认为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分层的冲突理论提供了一个基础。它的缺陷是过于简单，只从财产占有这一个维度来进行社会分层，因此有必要做些修改。韦伯的分层模式可以视为对马克思模式的一个修改或发展。韦伯提出从经济阶级、地位群体和政治权力三个维度来进行社会分层，增强了其分层模式的解释力。然而韦伯的模式仍然有缺陷。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的分层模式（以及其它一些例如功能主义的分层模式），都是把社会分层当做一种纯粹宏观的现象来加以描述，都是以团体做为自己的分析单位。而实际上，正如戈夫曼等现象学的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社会”、“阶级”等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实在，真正存在着的只不过是个人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已。一个科学的分层理论必须把每日生活中个体可观察的行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必须以日常互动的经验现实为基础来建立社会的分层模式。

基于上述观点，柯林斯提出了一个新的以个体行为和影响个

体行为的各种因素(职业、双亲的职业、教育、种族、年龄、性别等)为主要变量,以描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命题为主要形式的分层理论模式。柯林斯认为,决定个人的阶级地位及行为方式的主要因素是职业,因为职业是人们维持生活的基本方式,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其中的领域。因此,柯林斯首先从职业分层来开始他的分析。

柯林斯指出,人们在职业地位上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统治(权力)关系、职业沟通网络中的地位以及所控制的财富数量与所履行的任务的体力性质。其中最重要的是统治(权力)关系。他说:“在工作位置之间最关键的差别是包含在其中的权力关系(人们发布或接受命令的各种方式)。职业等级本质上就是工作范围内的权力等级。”^①根据人们在工作中的权力关系,可以区分出上层、中层和下层三个主要的职业等级。这三个等级的个人不仅在上述三个方面存在着差别,而且在世界观、生活方式、交往态度、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认同程度等方面都存在差别,这些差别构成了不同的职业“阶级文化”。

为简明起见,柯林斯概括了一套有关职业阶级文化的形式命题,这套形式命题又以8个公设为前提。这8个公设是:

1. 每个个体构造他自己的主观现实。
2. 个体的认知是在社会沟通中构造起来的。
3. 每个个体都拥有影响他人主观现实的能力。
4. 每个个体都力图在他自己和他所接触的他人可得到的资源所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主观地位。
5. 每个个体都对自己最擅长的方面予以最高评价,并且尽可能地表现和谈论它。
6. 每个个体都追求那种能给予他最高主观地位的社会接触,

^① 柯林斯:《冲突社会学》,纽约学术出版社1975年版,第62页。

避免那些他只有最低地位的接触。

7. 在个体的资源存在着差别的地方，社会接触必然包含着在定义主观现实的权力上的不平等。

8. 在存在着不同的权力而又不能直接撤出的场合，必然蕴含着冲突。

以这 8 个公设为前提的有关职业阶级文化的一套命题是：

1. 发布和接受命令的经验是决定个体世界观和行为的主要因素。

2. 社会沟通的数量与结构（即社会密度）是决定个体世界观与行为的第二组因素。

3. 权力与社会密度在许多不同的生活领域都能被经历到：工作、政治、家庭、社会娱乐，以及地理移动。个体的世界观是所有那些经验的线性总和的产物。

命题 1. 和 2. 又为一些更为形式化的子命题所补充。例如命题 1. 又伴随着“一个人越是发布命令，他就越是感到自豪、自信，越是刻板，越是认同于使其命令合法化的组织观念”等 8 个子命题；命题 2. 又伴随着“越是有他人在场，一个人就越会接受群体的文化，越期望与他人准确地一致；反之，他周围的人越少，他的态度就越趋于个体化和自我中心化”等两个子命题。

柯林斯指出，除了工作关系外，人们还在其它许多领域如家庭生活、友谊团体、居住社区、商场、旅游等场合中发生交往。在这些交往关系中也存在着分层结构，它们对个体的行为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一个充分的分层理论模式必须把影响个体行为的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但是，柯林斯认为在所有这些因素中职业分层是最重要的因素，它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世界观和行为，而且还影响个体社会交往的其它方面（如家庭关系、友谊群众、居住社区等）。此外，在上述职业分层模式中所陈述的基本公设与原理，实际上是一些适用于所有分层领域的一般假设与原理。例如在家庭中

人们依据性别和年龄也分化成一些具有不同世界观的群体,这些分化与他们在家庭中发布与接受命令的经历以及在家庭内外交往的数量与结构等因素也是紧密相联的。因此,上述职业分层模式,实际上为一般分层理论提供了一个最初的原型,其它各领域的分层模式都只不过是这个原型的应用或变异而已。

三、微观社会学与分层

上述分层模式在紧挨着的第三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在上一章中,柯林斯侧重考察了各种社会交往领域中的分层结构如何影响了个体的世界观、行为以及“阶级文化”的其它方面。在第三章中,柯林斯则以各种微观社会学的理论为基础,侧重于从微观分析的角度,来进一步阐述各种社会交往及分层结构本身是怎样通过日常互动过程建构起来的。他首先对微观社会分析的两种主要传统——动物生态学传统和社会现象学传统的历史作了简要的考察,指出这两种传统的研究成果都表明仪式化、言语非系统化等方面是人们“遭遇”中的根本特征,正是这些方面形塑着人们的社会关系,使共享性符号现实的构造成为可能。以此为出发点,柯林斯构造了一个“谈话互动模式”,企图表明谈话这种最平凡、最普遍的社会活动正是所有社会网络得以构筑而成的“砖块”,各种阶级和地位群体关系以及与它们相伴随的各种阶级文化正是通过谈话这种活动而得以形成和持续的。

柯林斯认为,社会结构是由熟人网络和人们相遇时所吹胀起来的各种主观现实的“泡沫”所构成的。而这两者都只不过是谈话现象。一般而言,如果人们不能相互交谈他们就不会有关系。他们的所谈决定他们所能有的关系。描述谁对谁说了些什么,也将是描述大部分社会结构。生活就是一系列正在进行的谈话、协商过程。

谈话可以分成六和基本的类型：实用谈话、意识形态性的谈话、知识性讨论、娱乐型谈话、闲聊和私人谈话。所有的谈话都是一种讨价还价似的协商过程。被协商的内容包括此刻的认知性现实和谈话者间的人际关系。谈话也是一种交换。每个人都带着他在先前的谈话际遇中所获得的资源进入谈话市场，去寻求主观地位等方面的满足。如果个体的谈话收益大于他的谈话费用，他就将对谈话持积极的态度；反之他就将退出谈话过程或对谈话持消极应付的态度。

社会分层通过谈话活动得以建构和维持。在职业或社会群体中占有不同地位的人，会拥有不同类型的谈话资源和谈话机会、不同的谈话优势和谈话风格，以及在不同的谈话情景中会有不同的谈话费用和谈话收益。正是在各种谈话活动中，社会分层得到了体现和巩固。谈话分析可以为分层理论提供一个经验的基础。

与前一章相应，柯林斯也总结了一套有关谈话以及谈话与分层关系的形式命题。主要内容有：

(1)谁将同谁交谈一些什么取决于个体间相互遭遇的机会以及他们以前相互间曾经有过的谈话。

(2)同一些人相遇的次数越多，他们就越乐意交谈。

(3)不同的组织位置的占有者，在实用谈话、意识形态性谈话的种类上也不同，并因而在他们的世界观和相关方面也不同。

(4)一场谈话交换越是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参与者之间的人际联结就越紧密。

(5)一个人从一种谈话中感受到主观地位越高，他就越趋于进行那种谈话。

(6)人们的工作场所越靠近，职业经历、职业地位、收入、住所、娱乐等越相似，就越容易成为朋友。

(7)某人在某时某刻之所思取决于他刚有的和期望有的谈话。应用这些命题，可以对分层过程作出更为经验性的分析。

四、遵从、举止与社会分层

人们的许多交往都是仪式化的,人们在交往中的遵从和举止尤其是如此。在《冲突社会学》的第四章中,柯林斯以大量历史资料为基础,对人类社会各个阶段上遵从和举止仪式的不同形式进行了考察。通过这种考察进一步表明各种分层变量是如何影响人们的互动风格以及如何通过它们表达出来的。

柯林斯提出,与前述关于阶级文化中所讨论的一样,影响遵从和举止仪式化状况的因素也主要有两个,即权力关系和社会密度。权力关系主要涉及资源分配尤其是权力与财富的不平等。社会密度则指的是与某人一同在场的他人的数量(因而某人行为受他人监视的程度),以及人们交往的多样化或世界主义化程度。这两个因素的交错变化构成一系列不同的情景条件,从而导致遵从和举止行为仪式化的不同状态。例如,高度的权威加上高度的监视将导致一种强烈的和难以逃避的服从性仪式文化;而在高度的权威加上低度的监视的条件下,集体意识则更为虚弱和世俗化,各种遵从性仪式也更为草率和易于逃避等等。柯林斯概括了一套有关遵从和举止的形式化命题,主要的命题形式有:

- (1)遵从和举止仪式产生于社会密度状况和权威关系的结合。
- (2)权力资源越不平等和监视程度越高,细微的仪式性遵从行为就越是经常被要求。
- (3)权力资源越不平等和交往的多样化程度越高,遵从仪式就越精细,所应用的标准就越复杂。
- (4)权力资源越平等和监视程度越高,人们越趋于与群体包容的仪式相一致。
- (5)生活方式越充满了危险和畏惧,应急性的团结仪式就使用

得越多,对违反仪式的惩罚就越严厉。

(6)好运气越具有情节性,庆祝活动就越具有仪式性。

(7)内部平均主义的团体之间越具有层次性,具有或被排斥成为某一团体的资格对个体来说就越重要,团结成员资格的标志就越仪式化。

(8)在既定的分层条件下财富被用于产生最大数量的可能的主观地位。

五、性别和年龄分层

性别分层和年龄分层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方面。在第五章中,柯林斯将分层的冲突理论应用于家庭内部,对性别和年龄分层进行了考察,试图表明家庭组织和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变化也可以依据拥有不同的个人及外部资源的各种性别与年龄群体之间为争夺统治权而展开的斗争来加以解释。

柯林斯首先考察了性别分层。他从三个有关性别分层的理论公设开始。这三个公设是:

- (1)人类有着性别分层的强烈动机;
- (2)人类强烈地抵制被压迫;
- (3)男人通常比女人要更大和更强。

以此为基础,并结合历史上几种不同类型的性别分层模式的考察与分析,柯林斯概括了一套用于解释性别分层的形式化命题。其中主要的命题包括:

(1)某一性别对暴力手段和物质资源的控制程度越高,它对性活动的控制就越高,从从属性别那里所能调动的辅助性服务就越多。

(2)在不存在其它资源的情况下,较大的性别群体的成员总是

性侵略者和性活动日程与程序的控制者,较小的性别群体的成员则总是试图避免性接触,以便避免被强制。

(3)占统治地位的个人占有他人作为性财产的权力越大,戒律就越严格,对违反那些财产权利的愤恨就越大。

(4)一个社会超出维持生产者生命之外的经济剩余越少,能被占统治地位的性别强加于从属性别的工作就越少。

(5)围绕着妇女的工作而组织起来的经济资源越多,亲属系统就越可能是母系的。

(6)女性一边的血缘团结越强,妇女在家庭事务中的权力就越大。

(7)家庭事务中力量集中的程度越高,男性对于女性在卑下的劳动、仪式化的遵从和性道德标准方面的权力就越大。

(8)家庭作为一种组织单位所具有的经济和政治价值越大,亲属间的联系就越疏远、越冷淡。

(9)被一个既定的性别中的个体所控制的物质财产越多,其他性别的人就越必须拒绝将性接近用于做为一种在长期的经济交换中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

10. 在排除了物理强制的性谈判场合中,一个人的性吸引力越大,经济资源越多,他(她)能成功调动的遵从也就越多。

在考察年龄分层的部分,柯林斯也提出了一套相关的解释性命题。它们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1)关于占统治地位的年龄群体所采取的控制方式与其后果之间关系的一组命题。如“占统治地位的年龄群体对物理惩罚使用得越多,从属年龄群体的反抗性就越强,就越强调外部的一致性,对权力拥有的评价就越高”、“越是通过羞耻感来进行控制,从属群体就越重视对外部举止的自我控制,越会与群体期望相一致”等等。

(2)关于占统治地位的年龄群体如何选择控制资源的一组命

题。中心命题是：“占统治地位的群体总是使用它容易获得的那些控制资源。”具体包括“其它资源相等，占统治地位的年龄群体拥有的物质财富越多，就越强调以物质报酬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其它资源相等，双亲闲暇越多，就越强调以社会性报酬作为控制手段”、“可获得的其它资源越少，就越会采用暴力作为控制手段”等一组子命题。

(3)有关对儿童进行控制的程度及方式的一组命题。中心命题是：“儿童能为成人提供的工作或地位越多，成人就越重视对他们的控制”。具体又包括“来自儿童的劳动需求越重要，暴力控制就将越多地被采用”、“儿童对家庭地位的作用越重要，非疏远性的控制就越受重视”等一组子命题。

(4)关于儿童摆脱控制的一组命题。包括“儿童越有吸引力，它在与成人协商愿望方面就越能成功”、“儿童越大，越易逃避双亲的控制”等等。

运用这些命题，就可以对各个年龄群体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及关系做出具体的、精细的经验分析。

六、组织理论

组织理论是柯林斯“冲突社会学”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第六章“一个冲突的组织理论”中，柯林斯以贯串于分层理论中的那些基本思想（冲突性的遭遇形塑着人们的利益和世界观、资源和策略上的变化影响着人们之间的互动、结构是这些互动的结果等）为基础，从冲突论的角度，对组织控制过程和组织结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被认为是相当新颖的、形式化的组织理论模式。

柯林斯首先讨论了组织控制的过程。他提出一个组织就是一

个人们之间相互影响的网络,决定人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的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他们所应用的激励的类型。激励是组织控制的首要方面。激励的类型不同,组织控制的形式也就不同。

柯林斯指出激励有三种主要的类型:强制性威胁、物质报酬和对理想的忠诚。不同的激励类型会导致不同的组织过程及行为效果。在这方面柯林斯概括了以下几个主要的形式化命题:

(1)强制会导致避免被强制(逃跑、反击、消极服从等)的强烈努力。

(2)通过物质报酬来进行控制会使屈从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报酬要与被期待的行为直接相联。

(3)一个人越以组织的名义发布命令,他就越与该组织相认同。

(4)一个组织内的成员越是已经相互承担了义务,或者一个组织内部气氛越是有助于创造个人友谊,或者一个组织内的成员们越是意识到来自其它组织的危险或敌意,成员对该组织的忠诚和潜在的忠诚就越高。

(5)在现实的组织过程中,强制、物质报酬和忠诚多是混合使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效果是各自比重的线性结合。

除了激励之外,行政管理手段也是组织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几种主要的行政管理手段及它们对组织过程的影响是:

(1)监视。一个上级对下级的监视越是密切,下级就越是与可见的行为要求相一致。

(2)效率标准。越是重视通过检查工作成果来进行控制,工人对可见的产出的关注就越高。

(3)规则。越是依赖于成文的或正式的规则来进行控制,组织成员的行为就越标准化。

(4)信息控制。个体在控制组织内部不确定领域的有关信息方面越是唯一,他控制他人行为的权力就越大。

(5)环境控制。一个组织成员所能得到的物理选择越少,他就越是专心于分配给他的任务。

一个组织适宜于采用何种激励类型及行政管理手段,与它所承担的任务类型有很大关联。柯林斯提出了三个这方面的命题:

(1)执行一项任务所需的主动性越低,活动越是可见,采用伴随监视、规则或环境控制等行政管理手段的高度强制性激励就越能成功。

(2)产品越是标准化和可预见,采用物质报酬的激励和以效率标准为行政管理手段的策略就越能成功。

(3)一项任务所需的主动性越高,产品越不可预见,它的成功完成就越依赖于强烈忠诚之类的规范控制。

组织结构是组织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一部分,柯林斯再次重申了现象学的组织理论观点:组织不过是一群相互联系真实个人的实际行为而已,“组织结构”概念只不过谈论人们的行为如何重复性地指向他人的一种方式。因此,和一般分层结构的解释一样,也必须以人们的日常互动过程为基础来解释各种组织结构的形成和维持,来建立有关组织结构的各种解释性命题。

参照韦伯的组织理论,柯林斯提出了用以区分组织结构类型的两组变量:一是权力在成员之间的集中化或分散化程度,二是人际关系的人格化或科层化程度。集权化的程度不同,或者科层化的程度不同,组织的结构也就不同。柯林斯进一步陈述了解释组织结构的几个主要命题:

1. 集权化与分权化。控制资源的集中程度越高,集权化程度就越高。

(1)群体规模越小,指挥链上的环节就越少。

(2)群体的地理分散程度越小,被领导监督的程度越高,成员就越趋于可见的行为要求相一致。

(3)物质资源集中于领导手中的程度越高,集权化程度越高。

(4)成文的规则与标准化的报告使用的越多,在规模较大、成员地理分散程度较高的组织中维持集权控制就越容易。

(5)交通和通讯技术越有效,在规模较大与成员地理分散程度较高的组织中维持集权控制就越容易。

2. 人格化与科层化。科层化的程度取决于技术与组织资源的可得性,以及促使有关个体依赖于非人格化控制手段的那种场景。

(1)文字记录与沟通所需的材料与技术的可得性越大,科层化的潜力越大。

(2)交通和通讯技术越有效,科层化的潜力越大。

(3)宗教或其它促使个体独立于家庭、社区等先赋关系的文化组织越有效,科层化的潜力越大。

(4)组织规模越大,成员地理分散程度越高,它的领导就越趋于采用科层控制技术。

(5)来自不顺从的下属官员或已科层化的外部组织的威胁越大,一个组织的领导越趋于采用科层制。

(6)领导可用于人格化控制的资源越少,他就越趋于实行科层制。

(7)要求分散控制和阻止长期使用人格化权威的压力越大,对科层化的强调就越大。

运用上述一般命题,就可以对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组织结构做出详细的经验分析。在第七章中,柯林斯便把它们运用到了国家这种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上。

七、国家、经济与意识形态

柯林斯指出,国家是一种暴力组织,国家就是由拥有枪支或其它武器并且准备使用它们的那些人所组成的。一种政治理论就是

对国家结构也即暴力是如何被组织起来、人们的利益是如何影响国家的政策与结构、什么因素决定着那些利益集团将在这个过程中取胜等问题所做的一种解释。作为一种组织，国家的结构也受组织理论所阐述的那些变量与命题所支配。作为一种特殊的暴力组织，它也受一些特定的变量如经济生产技术、武器技术与行政管理技术的影响。

柯林斯首先从军事组织这个国家的核心部分开始他对国家的分析。在这方面他提出的一些主要命题有：

(1)经济生产技术限制着政治组织结构的潜在规模。

(2)在初级生产中每个劳动者生产的超出维持其生存的剩余产品越多，政治组织和政治不平等的潜力就越大。

(3)经济剩余越多，军事人员在人口中的比重就可能越大。

(4)军队的组织取决于武器费用，以及它们是否被个体还是群体使用。

(5)军队的供给越是集中支配，指挥员的权力就越大，组织统一就越持久。

(6)一个国家的形式依赖于主要军队自其财富获得支持的方式。

国家首先由军事组织所构成，但国家的维持并不能仅仅只靠暴力，它还需要有意识形态的参与。但一个国家会产生何种类型的意识形态，则取决于条件的变化。

(1)忠诚观念和道德观念反映了个体为了自身安全与支持所必须取向的社会单位(家庭、部族、社区、联盟等等)。例如，权力与资源越是位于家庭内部，宗教礼仪就越是趋于发生于家庭中，忠诚观、上帝观越是与家庭相一致等。

(2)观念的种类反映了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例如群体内部越平等，其宗教就越强调大众参与性的仪式、成员资格符号和成员皆兄弟的观念，反之则否。

(3) 仪式所促进的目标随仪式参与的志愿性或机械性程度的变化而变化。例如,机械性程度越高,仪式就越倾向于促进对代表这个组织的那种神或象征物的特殊忠诚,且后者越被用于祈求物质福利。

(4) 意识形态性信仰的世俗或先验的本质取决于群体成员在接触中所经验到的普遍主义程度。

(5) 对某种意识形态承诺的强度依赖于互动的社会密度和受到的物理威胁的水平。

国家作为一种暴力组织,可以为支配它的人带来各种利益。因此,复杂国家内部总是充满了政治斗争。许多利益集团都试图借助国家的强制力量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对这些政治斗争也有一些一般性原理可以提出:

(1) 一个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与它的内部动员程度成正比。

(2) 某个组织位置所控制的物质资源越大,政治影响就越能被用于代表该职位的利益。

(3) 某些个体拥有的将他们组织成一个地位团体所需的资源越多,他们的政治影响就越大。

(4) 一个利益群体拥有的用于导致和形塑社区仪式的资源越多,反动员的机会就越少。

(5) 被动员的个体们越是共享一种集体利益,国家就越会维护这种利益。

(6) 危机越深刻,为政治行动而动员起来的利益就越多,改变政府政策或结构的潜力就越大。

(7) 一个利益集团越能为组织政治行动而动员起来,它在危机中就越能支配国家。

(8) 一个新的统治集团越能尽快结束政治危机状态,它就越能把握住政治。

所有这些命题构成了柯林斯政治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柯

林斯运用这些命题对历史与现实中的某些政治过程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的看法。

八、财富分配与社会流动

财富的分配和社会的流动是社会的基本过程之一。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不能不对这些过程进行讨论。一种“冲突社会学”的理论就更是如此。在《冲突社会学》第八章“财富与社会流动”中,柯林斯从“冲突社会学”的观点出发,对财富的分配、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考察,提出了一套相关命题,构造了一个冲突论的财富分配与社会流动的理论框架。主要命题包括两大部分:

1、有关财富增长及分配的命题。

(1)财富总量。一个社会在某一给定时段内的商品与服务的总量是其自然资源、劳动人口规模、劳动的时间与强度、所用技术的效率、劳动分工的效率、过去商品的积累与进步等因素的综合结果。

(2)国家直接分配。如果财富由国家直接分配,那么财产与收入的分配与政治权力的分配相一致。

(3)国家和财产。如果国家仅仅维持一个财产系统而允许收入通过私人市场来分配,那么政治权力将主要影响到财产的分配。

(4)组织化部门的财富。在一个私人市场经济中,组织化部门在自然资源的占用、交通的便利和生产与管理技术的获得方面所据有的优势越大,他们在财富总量中占有的比重就越大。

(5)组织内部的财富分配。一个群体可调动遵从的权力越大,它占有的属于组织的财富比重就越大。

2. 有关社会流动的命题。

(1)基本命题:社会流动的数量取决于为垄断资源以作为持久的位置与组织和为创造新的位置与组织所做的资源分配。

(2)组织化资源分配的越广,社会流动率越高。

(3)组织内部的流动。一个组织内部权力资源越集中,组织内部的流动就越少。

(4)个人成功。一个人在熟人网络中越接近空缺的、或在冲突和其它转变中可创造出来的资源性位置,他个人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以上所述大体上概括了《冲突社会学》一书的主要内容。综其所述,可以看到柯林斯在该书中所阐发的基本思想是:人们总是自我利益的追求者;人们在实现自我利益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策略与观念依赖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资源的分配是不平等的;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导致了人们在地位及相应的行为与观念方面的分化与冲突;这些分化与冲突又进一步调整着资源的分配和人们利益的实现过程。因此,分化与冲突既是利益竞争和资源分配的结果,又是它们的原因。柯林斯从微观分析的角度来阐释社会的分层、组织与冲突过程,并努力构造一个高度形式化的命题体系,使得他的《冲突社会学》一书具有了独特的风格,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厉以宗